

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在政治决策中的哲学逻辑

古丽亚尔·艾尼亚尔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 海南 海口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16日

摘要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原则在其哲学体系中占据着枢纽地位, 这一思想不仅塑造了他的伦理学进路, 也为其政治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立足于古希腊城邦的历史语境, 中庸之道最初指向的是对政治动荡的理论回应——通过对极端倾向的节制与调和, 为城邦共同体寻求一种更具韧性的秩序架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真正的政治智慧并非偏执于一端, 而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与价值导向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从中庸之道的哲学逻辑出发, 将其引入对当代政治决策过程的再审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 政策制定面临着愈发复杂的价值冲突与现实约束。无论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 还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重分配, 都在呼唤一种更具“适度感”的决策思维。中庸之道所提供的, 恰恰是这样一种避免极端、追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同时将在厘清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理论脉络的基础上, 结合现实政治决策中的具体议题, 探讨这一古典智慧在当代语境下的适用空间与实践可能。研究的最终目的, 并非为现实问题提供唯一答案, 而是试图在理论资源与现实困境之间架设一座可供反思与对话的桥梁。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 中庸思想, 政治决策, 哲学逻辑

The Philosophical Logic of Aristotle's "Thought of the Mean" in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Guliyaer·Ainiyaer

School of Marxism, Political Science,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Received: February 13, 2026; accepted: March 5, 2026; published: March 16, 2026

Abstract

Aristotle's principle of the golden mean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n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shaping not only his ethical approach but also laying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for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itially emerged as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seeking to temper and reconcile extreme tendenci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a more resilient framework of order for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For Aristotle, genuine political wisdom does not lie in adhering stubbornly to one extreme, but rather in maintaining a dynamic equilibrium among diverse interest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visi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through the philosophical 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an era of intensifying globalization, policymaking increasingly confronts complex value conflicts and practical constraints. Whether in delineat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market forces and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or in balancing the competing demands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for a decision-making mindset characterized by a sense of “proportionality”. What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offers is precisely such a framework—one that avoids extremes and pursues equilibrium. By clarifying the theoretical lineage of Aristotle's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engaging with specific issue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and practical potential of this classical wisdom in modern context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is not to provide definitive answers to real-world problems, but to construct a bridge of refle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dilemmas.

Keywords

Aristotle, The Thought of The Mean,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hilosophical Logic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概述

(一) “中庸”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中庸”观念在古希腊文化中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1]，诗人潘季里特在《祈祷诗》中隐约流露出对适度与适中状态的向往[2]。此后，毕达哥拉斯宣称“一切事情，中庸最好”，将中庸提升为普遍准则；赫拉克利特认为事物的和谐源于对立面的平衡与中和，这些早期哲人的探索为亚里士多德建构中庸学说奠定了基础。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中庸思想脉络更清晰[3]。苏格拉底追求灵魂内在和谐，行为避免极端；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时将中庸原则纳入制度设计，但他的精英治理构想引发后世诸多争议[4]。

真正将中庸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完整哲学体系的是亚里士多德[4]。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认为美德是因时因事而异的适度状态[5]。这套框架为伦理学开辟了新路，也影响了他对其他领域的思考[6]。政治上，亚里士多德主张以中产阶级为中坚构建共和政体[7]。他意识到城邦贫富两极对峙会导致民主制与寡头制交替动荡，中间阶层发挥稳定作用才能平衡利益、维持秩序。美学领域，他强调“适度”，艺术作品既不能浮华也不能单薄，形式与内容相称才能达美。综观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凭空生成的抽象教条，而是在批判性吸纳前人智慧的基础上，

逐步生长出的理论果实。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重要遗产，这一思想不仅影响了后世伦理学、政治学与美学的走向，也为我们在今日思考复杂问题时，提供了一种不偏执、不走极端的思维路径——或许，这正是它历经两千余年而仍未过时的缘由所在[1]。

(二) “中庸”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其核心要义在于对“适度”的追寻——那是一种既非过火、亦非不及的动态平衡状态[7]。在他看来，世间万物皆可归于三种情形：过度、不足与适中，而唯有后者，因其契合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定性，方能维系其和谐与稳定[8]。落到道德实践的层面，这一道理尤为显豁：勇敢被视为德性，但若过了头，便沦为鲁莽；若有所不及，则又滑向怯懦[9]。唯有在具体情境中拿捏得当，那份勇敢才算真正贴合其名[10]。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亦然——暴食招致肥胖，节食引发亏空，适度进食方能护持身体的康健。凡此种种，皆是中庸思想在日常中的自然流露[11]。

此处“中庸”非固定数学中点[2]。亚里士多德区分绝对中道与相对中道：前者是几何概念，如线段中点恒定；后者关乎人事，为人、时、地而异的适度状态，像运动员训练强度和饮食标准需结合自身调适，人们对道德“适度”的感知也随历史文化变迁[3]。中庸思想有边界这是需要厘清的，以防与折衷主义混淆。亚里士多德认为，恶意、无耻等情感和奸淫、偷盗等行为无“中道”，因其本身恶性，无论“过度”“不足”都应受谴责。折衷主义简单调和不同立场，缺乏价值取向；而亚氏中庸是洞悉本质后理性审度的价值抉择，二者不同。

2. 政治决策的哲学基础与逻辑架构

(一) 政治决策：概念与定位

所谓政治决策，大致可以理解为政治主体，通常是政府，在面对重大公共问题时，确立行动方向、设定目标，并最终择定行动方案的过程[12]。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到地方性公共政策的出台，这一过程几乎渗透进现代治理的每一个角落：财政预算的编制、教育政策的调整、外交关系的取舍，皆可归入政治决策的讨论范畴[13]。在现实运转中，政治决策承担着多重功能。一方面，它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关键机制——谁获得什么、何时获得、如何获得，往往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手中的那一支笔[7]。税收如何征收、财政向何处倾斜，直接牵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也左右着社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14]。另一方面，政治决策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通道。当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政策便成为调停与整合的工具，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回应诉求、缓和张力，从而维系社会的秩序与稳定[11]。

(二) 政治决策的哲学根基

任何决策都暗含着某种哲学预设，正义、公平与理性，无疑是支撑政治决策最为基础的三大价值坐标。而本文所欲深化的讨论，则聚焦于亚里士多德以“实践智慧”为核心的“中庸”逻辑——它提供了一种超越程序正义与功利计算的“德性决策”模型，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命题。

正义是政治决策的价值底线。亚里士多德曾将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前者主张依据个体的贡献与能力分配社会资源，后者则关注对不公行为的纠正与补偿。在政策实践中，正义意味着弱势群体不被遗忘，公共利益不被私欲遮蔽。例如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若不能向最需要的人群倾斜，正义便难免流于空谈。

公平则是政治决策的信任基石。它要求决策者在面对不同群体时，保持一视同仁的立场，不因身份、地域或财富的差异而有所偏倚。选举制度的设计之所以强调人人平等，正是为了确保权力分配的公正性，让制度本身获得公民的认同与信任。没有公平的决策，再精巧的设计也难以获得社会认可。

理性是政治决策的方法支撑。它强调决策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分析为工具，避免被情绪或短期利益裹挟。经济政策的制定便是典型案例：决策者需要研判宏观经济形势、市场运行规律与资源禀赋条件，

借助数据和理论进行推演，方能找到那条符合客观规律的路径。理性未必能保证决策完美，但至少可以让它免于盲目。

正是在正义、公平与理性这些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得以进入政治决策的讨论场域。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政治智慧不在于固守某一极端的价值，而在于如何在具体情境中拿捏分寸——让正义不至于演变为苛责，让公平不至于滑向平均主义，让理性不至于变成冷冰冰的计算[1]。这种“度”的把握，恰恰是本文试图探究的核心议题。

3. “中庸”思想与政治决策的内在联系

(一) 目标之维：平衡、协调与稳定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之所以能与政治决策形成深层呼应，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共享同一价值指向——如何在复杂情境中寻得那个“适度”的位置。对于政治决策而言，这一适度具体呈现为三重相互关联的目标：平衡、协调与稳定。所谓平衡，并非机械地等分或简单的利益摊派，而是在多方诉求之间寻求一种具有韧性的均衡[15]。现代社会利益主体多元，诉求各异，政策若过度向某一方倾斜，便难免埋下冲突的种子。平衡的要义在于：让各方都能在政策中看到自己的关切被考量，但又不至于让任何一方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这种平衡不是静态的妥协，而是动态的调适，其尺度在于社会的整体福祉。

协调是平衡在社会关系上的延伸。政策是资源分配和关系调节机制，民族政策制定就是例子，不同族群有文化传统和发展诉求，政策不能强行同质化或放任疏离，要在尊重差异基础上寻求共生，这背后是对差异的适度包容和对共同利益的审慎维系。

稳定是平衡与协调的结果，也是政治决策推进的前提。亚里士多德不反对变革，但提醒过急变动和过度保守都危险。政治体制改革要把握分寸，改革是回应新问题，若节奏不当、步伐过猛，会动摇社会秩序，渐进式改革的智慧在于让变化在可承受范围内发生，实现新旧平稳过渡。

(二) 过程之维：从问题识别到执行调适

如果上述讨论关注决策“往哪里去”，接下来要追问“如何走完这条路”[6]。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可贯穿决策各环节，成为推动理性运作的方法论支撑[7]。

问题识别是决策起点，易受偏见影响。现实问题有多重因果，如环境污染不能仅怪企业，还需考虑发展阶段、居民行为和监管漏洞[8]。中道思维要求决策者克制认知，还原问题复杂面貌，为后续判断奠定客观基础[9]。方案拟定阶段，中道体现为把握“度”[10]。激进与保守间有可行之路，如城市交通规划，过度追求短期效果或维持现状都不可取。适度方案要兼顾问题、约束条件，有革新勇气与克制清醒，备选方案需在现实与理想间找可行点。方案评估是多维度价值交汇点[7]。经济效益重要，但不能牺牲环境或加剧不公。中道思维防止决策者被单一标准左右，优化方案需在多目标间达成适度均衡。

决策执行环节，再周密的方案落地也可能遇意外阻力，此时固守原计划背离中道灵活精神。如教育政策推行遇问题，适时修正并非否定决策，而是尊重现实。亚里士多德“相对中道”精髓在于因时因地而变，不失原则与方向。

4. 中庸思维的跨时空映照

(一) 雅典民主：权力配置的中道尝试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某种意义上可视作对权力集中倾向的自觉防范[15]。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与陪审法庭三足鼎立，各司其职又相互牵制——公民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容纳成年男性公民参与城邦决策；议事会负责筹备议程、处理日常事务，对大会权力构成程序性约束；陪审法庭则执掌司法，既可审查公共行为，也能审判公职人员[16]。这种权力分散与制衡的安排，暗含着对“适度”的追

求：既承认公民集体决策的正当性，也通过机构分化防止单一权力过度膨胀。

雅典民主的另一层“适度”逻辑，体现在参与资格的制度化约束上。担任公职需满足一定的财产与年龄门槛，这固然带有时代局限的烙印，但其初衷之一，是在广泛参与与决策质量之间寻求平衡——让政治共同体既不至于封闭为少数人的特权，也不至于因过度开放而丧失必要的审慎。

（二）中国古代治理：另一种平衡的实践形态

将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同样可以捕捉到与中庸思维相呼应的治理逻辑[17]。以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为例——其背景是汉初黄老“无为而治”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中央—地方关系与边疆压力，而诸子异说、百家殊方的思想格局，也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整合需求[11]。董仲舒的主张，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层面的“适度选择”：在众多学说中确立儒家为主导，以统一意识形态，维系政治秩序，但并非完全禁绝其他思想的存续[8]。这种通过主导思想整合实现国家治理平衡的思路，与亚里士多德在多元诉求中寻求均衡的中道逻辑，确有某种结构上的相通。

唐代科举制的推行，则在人才选拔层面呈现出另一种“适度”逻辑。魏晋以降，九品中正制渐成世家垄断仕途的工具，人才的流动与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科举制的突破在于：它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选拔依据，为庶族子弟打开入仕之门，体现了选拔的公平与广泛；同时，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确保所选人才具备符合当时政治秩序的价值取向。这种在“开放”与“筛选”之间、在“公平”与“秩序”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制度设计，与亚里士多德对“相对中道”的强调——因人、因时、因地而寻求适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中国古代治理实践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虽存在某种思维上的近似，但其理论根基与价值内核仍有本质差异。前者根植于儒家的礼治传统与大一统的政治现实，后者则源于古希腊城邦语境下的伦理学建构与“实践智慧”追求[16]。我们在此所作的对照，并非为了强行比附，而是试图打开一个跨文化的观察视角：对平衡与适度的追寻，或许是人类政治智慧中某种共通的母题[15]。

5. 回望与反思：中庸思想在当代决策中的适用边界

（一）价值所在：超越二元对立的决策智慧

当代政治决策面临的困境之一，是常常被“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所束缚[5]。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环保、管控与自由——这些张力构成的政策议题，往往迫使决策者在两极之间做出选择，而任何一种极端都难免付出代价。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维提供了一种超越性视角：真正的智慧不在于选边站队，而在于寻找那个动态平衡的“适度点”[15]。

以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为例，若执着于“绝对平均”，可能造成资源的低效投放；若放任“市场自发调节”，则可能加剧本已存在的城乡差距[16]。中庸思维引导的是一种“差异化补偿”路径——通过乡村教师专项补贴、优质课程资源共享等制度安排，既尊重城乡发展的客观差异，又保障公民基本教育权利的底线公平[17]。这种“适度均衡”的取向，恰恰是在二元对立之外开辟的第三条道路[9]。

在公共卫生政策争议中，中庸思维的平衡智慧同样有价值[18]。面对“严格管控”与“自由流动”的张力，非此即彼的选择易顾此失彼[19]。分区域风险等级管理、精准保障重点人群等措施，体现决策者在“保障公众健康”与“减少生活干扰”间的均衡努力。“精准防控”避免过度管控引发民情不满，也防止放任不管带来公共安全风险，形成的政策共识更易获社会认可。

（二）局限审视：古典智慧与现代语境的张力

然而，诞生于特定历史语境的思想无法完全超越时代局限[2]。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学说用于当代决策实践，有三重张力值得关注[3]。其一，是原则性与操作性的张力[4]。中庸思想强调“适度”，但“适度”无法量化[5]。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中，确定“适度”保障水平需权衡多重变量，仅凭“无过无不及”

原则难以得出精准政策参数,这种模糊性有时使决策偏向保守,无法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7]。

其二,是渐进逻辑与危机情境的张力。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维预设从容决策环境,允许反复权衡找平衡点。但当代政治决策常面临突发性危机,要求快速决断,与中庸思想的渐进逻辑存在内在紧张。如疫情初期过度追求适度平衡会导致决策犹豫、错失窗口,“极端”防控举措有时是必要手段。其三,是同质预设与文化多元的张力。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学说诞生于同质城邦共同体,预设共同体利益优先。但当代社会文化和价值多元,不同群体对“适度”“平衡”理解差异大。以移民政策为例,不同群体主张难以用“中间点”调和,机械追求“适度包容”无法满足诉求、缓解社会张力。在价值多元语境下,中庸思维实践需嵌入社会文化脉络,否则会沦为形式主义。

参考文献

- [1] 顾文泰. 中道与中庸: 合宜之思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与启示[J]. 西部学刊, 2025(11): 84-87.
- [2] 朱贺炜.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师范大学, 2025.
- [3] 王缉思, 刘卫东, 胡然.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内政外交前景——王缉思教授专访[J]. 当代美国评论, 2025, 9(1): 1-21, 125-126.
- [4] 芦晶.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中庸之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启示[J]. 嘉应文学, 2024(8): 83-85.
- [5] 王锐. 文明的冲突, 还是政治的冲突?——“文明冲突论”的思想史解读[J]. 史学理论研究, 2024(1): 137-150, 160.
- [6] 刘明洋. 中庸之道与亚里士多德实在观的哲学调和[J]. 新楚文化, 2023(33): 7-9.
- [7] 路雪莲. 亚里士多德基于“应得”的分配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8(6): 8-14.
- [8] 史云贵, 韩昕莲. 论中庸的“为政”思想与政体的演进——基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比较[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5(1): 115-123.
- [9] 黄彦嫔. “中庸”思想——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之比较[J]. 今古文创, 2022(32): 40-42.
- [10] 嵇冉冉. 亚里士多德的美育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22.
- [11] 全红丹. 亚里士多德与孟子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延吉: 延边大学, 2020.
- [12] 申发文.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0.
- [13] 裴雨墨. 论亚里士多德“中道”与儒家“中庸”的差别[J]. 文化学刊, 2020(3): 69-71.
- [14] 黄利辛. 《尼各马可伦理学》——适度在儒学中的释义[J]. 中国文艺家, 2019(11): 244-245.
- [15] 卜亭亭. 儒家“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中道”之辨析[J]. 大众文艺, 2019(16): 25-26.
- [16] 胡本泽, 郭卫华.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中庸”异同刍议[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5): 401-405.
- [17] 黄子萱, 张美红. 亚里士多德与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异同[J]. 汉字文化, 2019(12): 144-145.
- [18] 张亮. 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及其当代价值[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8.
- [19] 肖洪泳, 曹孝前, 刘莎莎.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读书会纪要(上) [J]. 岳麓法学评论, 2017, 12(2): 261-282.